

地方特色文化系列教材

南阳汉画像石艺术

徐永斌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 1-1-1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

地方特色文化系列教材

南阳汉画像石艺术

徐永斌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阳汉画像石艺术 / 徐永斌主编. —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81091-681-3

I. 南… II. 徐… III. ①画像砖—研究—南阳市—汉代 IV. K87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515 号

书 名 南阳汉画像石艺术

主 编 徐永斌

责任编辑 张天定 徐振云

整体设计 王四朋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2864669 (行管部) 0378-28250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E-mail: bangong@hupress.com

发 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54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前言

南阳有悠久的历史。两汉时期,是南阳历史上辉煌的时代。西汉时,南阳郡治宛是全国五大都市之一,故司马迁称宛“亦一都会也”;西汉末年,王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并由此登上了新朝的宝座。东汉时,南阳是开国皇帝刘秀发迹的地方,史有“帝乡”、“南都”之称。由于南阳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地位,就为两汉时兴起的厚葬之风提供了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

我国发现汉代画像石的历史很早,出土汉代画像石墓的地区很多,就其地域而言,主要分布于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徐州周边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南阳周边,其他还有山东地区、陕北地区、晋北地区、四川成渝地区、河南中部地区。就其数量而论,南阳已科学发掘汉代画像石墓40余座,集各类画像石3000余块。埋藏于地下1800余年的汉代画像石墓,今日已基本十墓九空,但遗留下来的汉代画像石刻却大部分完好如初。其画像内容有生产类、生活类、祥瑞类、故事类、神话类、天象类、图案类等,犹如一部“绣像的汉代史”,它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实物材料,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的社会生活。

本书重点介绍了南阳汉画像石的艺术特色,旨在开拓学生的视野,加深对南阳汉画像石艺术魅力的了解,提高艺术欣赏水平。由于本书面对的是大学生读者,所以我们在选材上更加注重通俗性、典型性,力争提高本书的阅读和欣赏效果,对于时下高校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目前,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家把大学生素质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等学校应要求学生选修一定学时的包括艺术在内的人文学科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艺术活动,增强学生的美感体验,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确,艺术教育在整个素质教育

中,对于培养人的创造性思维、提高人的审美素养、塑造健全的人格、构筑和谐社会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全面素质必不可少的手段。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编纂了《南阳汉画像石艺术》一书,力求对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有所帮助,使学生更加了解南阳深厚的文化底蕴,提高对南阳汉画像石的艺术欣赏水平。

本书分工如下:

徐永斌:第三章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

第四章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

附文,并对全书进行了审阅和修订。

杨雄飞:第七章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李文红:第一章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卢娜:第二章 第一节、第二节

袁歆:第六章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本书是在南阳师范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各位专家的指导下完成的,得到了刘湘玉副院长、陈文涛教授、张宏伟教授、张士钧教授、孙照金教授、杨青新副教授,南阳市汉画馆韩玉祥馆长、李陈广研究员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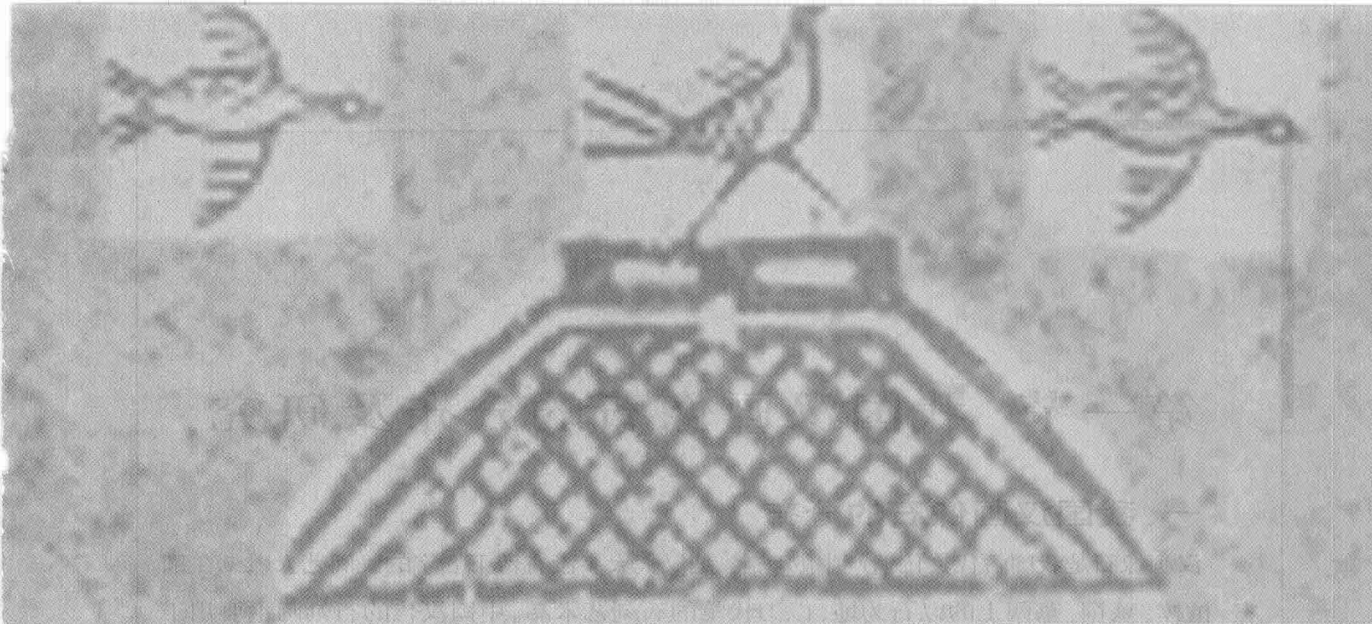
编者

2007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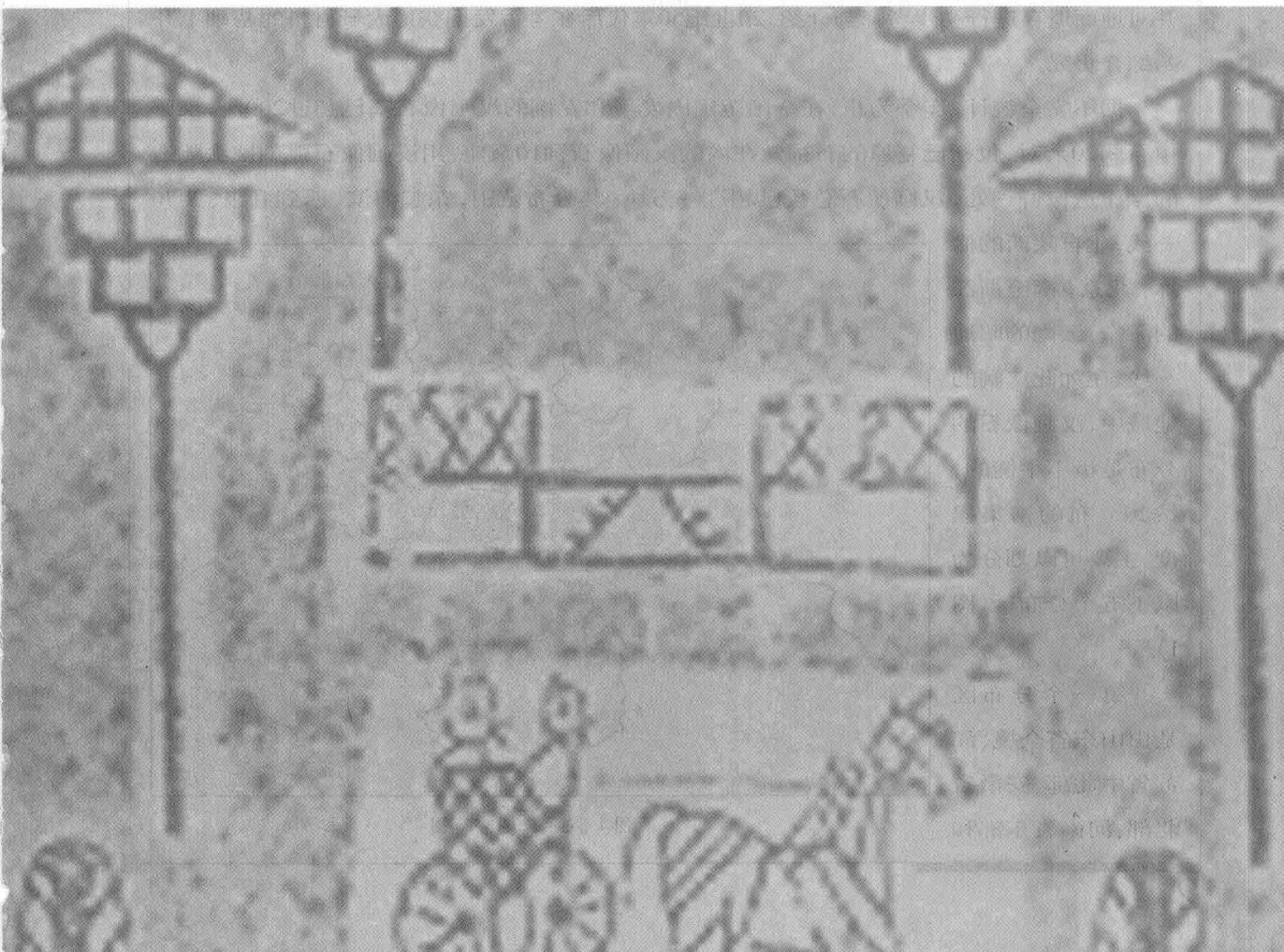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南阳汉画像石的发现	1
第一节 我国汉画像石的分布及研究	2
第二节 南阳及其汉画像石	9
第三节 南阳汉画像石的发现	11
第二章 南阳汉画像石的分布区域及产生的社会背景	17
第一节 南阳汉画像石的分布区域	19
第二节 南阳汉画像石产生的社会背景	20
第三章 南阳汉画像石墓葬形制及其画像发展演变	29
第一节 简明单纯——初创期(西汉时期)	30
第二节 具体生动——成长期(东汉早期)	39
第三节 气韵生动——发展期(东汉中期)	44
第四节 精微传神——成熟期(东汉晚期)	47
第四章 南阳汉画像石的艺术表现手法	51
第一节 汉代钢铁刀具(雕刻工具)对汉画像石雕刻的影响	52
第二节 南阳汉画像石的制作工艺及雕刻技法	57
第三节 南阳汉画像石的构图方法	69

第五章 南阳汉画像石的表现内容	77
第一节 社会生活	79
第二节 历史故事	105
第三节 神话传说	113
第四节 天文星象	121
第五节 祭祀礼仪	128
第六节 装饰图案	133
第七节 建筑风格	137
第六章 南阳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	141
第一节 楚画对汉画像石的影响	142
第二节 南阳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	147
第三节 南阳汉画像石与其他区域汉画像石艺术的横向比较	149
第七章 南阳汉画像石的影响	153
第一节 南阳汉画像石表现特征与艺术地位	154
第二节 南阳汉画像石的影响	157
第三节 南阳汉画像石中人物形象艺术剖析	177
附：南阳汉画像砖的发现及制作工艺	196
参考书目	205
后 记	206



第一章 南阳汉画像石的发现



河北省东南部组成的广大区域,以山东省西南部和江苏省西北部的徐州市为中心,东起海滨,西至河南省的安阳和永城一线,北自山东半岛的北端,南达江苏省的扬州,汉画像石的发现地点已达200余处。主要的发现地点,有山东省的嘉祥、金乡、东阿、鱼台、微山、汶上、济宁、曲阜、泗水、邹县、长清、肥城、泰安、枣庄、阳谷、平邑、平阴、费县、临沂、苍山、莒县、沂南、沂水、安丘、即墨、高密、章丘、福山、诸城、济阴,江苏省的徐州、铜山、睢宁、邳县、新沂、丰县、沛县、东海、连云港、赣榆、清江、宿迁、泗洪、泗阳、宝应、射阳,安徽省的淮北、宿县、亳县、定远,河南省的永城、鹿邑、夏邑、安阳等市县。在五个分布区中,这是地域最广阔、汉画像石分布最密集的一个区域,所发现的汉画像石数量占全国汉画像石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第二个分布区是以南阳市为中心的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地区。其范围北起河南省的叶县、襄城,南至湖北省的当阳、随县,汉画像石的主要发现地点有南阳、唐河、邓州、桐柏、社旗、方城、新野、叶县、襄城、当阳、随县等。从考古发现看,这里汉画像石的出现时间可以早到西汉中晚期之交,是汉画像石的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第三个分布区是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地区。汉画像石集中分布在陕西省的绥德、米脂、榆林、神木、子州、清涧、吴堡、彬县和山西省的离石、柳林、中阳等地。

第四个分布区是四川省和云南省北部地区。汉画像石集中分布在长江支流的嘉陵江和岷江流域,主要发现地点有四川省的成都、彭山、乐山、新津、新都、梓潼、雅安、宜宾、渠县、忠县、合川和云南的昭通等地。

第五个分布区是河南省洛阳市周围地区。主要汉画像石发现地点有洛阳市、密县、登封等。

除了上述五个汉画像石分布区,在北京市,天津市的武清,甘肃省的成县,江苏省的镇江、苏州,浙江省的海宁等地点也发现了少数汉画像石。

在这五个汉画像石分布区中,第一和第二两个分布区,早在西汉中期汉画像石墓就已出现和开始流行,是汉画像石的两大发源地,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两个汉画像石分布区。特别是第一个分布区,汉画像石不仅出现时间早,延续时间长,题材内容丰富,雕刻技法多样,配置规律严谨,而且类型齐全,墓室、石棺、祠堂、碑、阙画像石和摩崖造像一应俱全,是汉画像石艺术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区域。第三和第四两个分布区,其画像石虽迟至东汉早中期之交才开始出现,但都有强烈而鲜明的地方特色。尤其是第四个分布区,广泛流行的画像崖墓和画像石棺不仅为其他地区所不见或少见,而且其下限也可能晚至三国蜀汉时期(221~263年)。第五个分布区是惟一没有自身地方特色的汉画像石分布区,之所以将其列为一个独立的分布区,一是因为发现的汉画像石具有一定数量,二是其地理位置正好处于其他四个分

布区的中间,是个非常敏感的地区,通过对这一地区汉画像石艺术风格变化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分布区汉画像石影响力的消长和各分布区之间在画像石制作技术方面的交流和影响。

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这五个区域绝不是偶然的,这与当时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达有着直接关系。第五个分布区东汉时期正是首都所在的京畿地区,毫无疑问,这是当时经济、文化最繁荣发达的中心区域。第一个分布区为先秦时期的齐、鲁之地,不仅自古以来就是“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的富庶之地,而且是孔孟儒家学说的发源地,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两汉时期,这一地区的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刺史部是全国最先进的地区。仅以山东地区为例,在西汉政府最重视的冶铁、制盐、丝织三大官营手工业中,现在山东地区的处所数为全国之首。在当时全国的四十九处铁官中,设在今山东地区的铁官就有十二处,占了近四分之一;在全国的三十八处盐官中,设在今山东地区有十一处,占了近三分之一。特别是设在当时临淄的服官,有纺织工匠数千人,“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在浓厚的儒学传统所形成的良好的文化环境下,这一地区为汉政府培养了大量高级官僚,“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

汉画像石分布最集中的徐州周围地区,是两汉楚国和彭城国统治的中心区域,水网交错,河流纵横,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两汉共十八代诸侯王及其荫封的子孙在这里留下了众多规模巨大的坟墓,其中不少是画像石墓。例如,睢宁九女墩画像石墓所出的大量玉衣片就是墓主王侯身份的证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早在东汉明帝时期,楚王刘英就在这里“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使这里成为当时道教和佛教最流行的地区。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成为连云港孔望山佛、道摩崖造像群诞生的思想温床。

汉画像石作为汉代厚葬习俗的产物,它的出现,有其思想和物质方面的基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汉初统治者热衷于神仙传说,追求长生不老,永享极乐。当神仙不可见,长生不可得时,他们又迷上了“死即再生”的观念,希望生时极尽人世欢娱,死后还能继续。于是,墓室成了墓主生前环境的缩影。另一方面,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而行孝的大端,又无过于养生,生极其欲,死更厚葬。《后汉书·荀淑传》:“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以视天下莫遗其亲”。花钱千万为死者建造墓、阙、祠堂是孝的表现,《盐铁论·散不足》:“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可见在当时,生养的情况无关紧要,只要死葬能竭其全力,并将费值数目刻于石上,以告生、死者,就被看成是至孝的行为。这是汉画像石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汉初休养生息70年,终于迎来汉武帝刘彻统治的全盛时期,雄厚的财富积累使得厚葬蔚然成风。铁器时代的到来,也使汉代雕造画像

拥有得心应手的工具。这是汉画像石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

二、我国汉画像石的研究

1. 金石学对汉画像石的著录

对汉代画像石的记录，首见于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该书“济水”条较集中地记载了一些汉代石桐堂丽像。其中延引东晋戴延之《西征记》曰：“焦氏山北数里，有汉司隶校尉鲁峻冢。……冢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边皆刻石记之，文字分明。”这是对汉画像石最早的记录，另外，在“济水”条中还记述了汉荆州刺史李刚墓的石祠堂、其“叫壁隐起雕刻，为君臣宦属，龟龙麟凤之义，飞禽走兽之像，作制工丽，不甚伤毁”。又提到平阴（今属山东）东北“巫山”上有石室，世谓之孝子堂”，以及金乡的朱鲋石室等，前者即为迄今仍较完整地保存于地面上的孝章山石柯。从《水经注》对这些汉代石祠堂画像的记录情况看，虽然都是在记述水系和地理形势时顺便提及的，但可知当时已经把它们看作有历史价值的遗存了。

自北宋开始，随着以研究古器物文字为主的金石学的兴起，一些金石学家开始有目的具体著录汉画像石。北宋末年赵明诚的《金石录》，第一次记录了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及其榜题。南宋洪适的《隶杆》、《隶续》，进一步扩大了对各地汉画像石铭刻的著录，比起赵氏只有文字而无画像的著录，《隶续》又首开摹录汉画像石图像的先例。元、明时期，金石学渐衰，对汉画像石著录也少有提及者。

到了清代，金石学又重新兴盛起来。乾隆五十一年（1786）和乾隆五十四年（1789），金石学家黄易和李克正等人，在山东嘉祥武宅山掘出了湮没已久的武氏祠汉画像石。黄易在其《修武氏祠堂记略》中，曾惊喜地称：“汉人碑刻世存无多，一旦搜得如许，且画像古朴，八分精妙，可谓生平奇遗”。与此同时，黄易还与同仁好事者，精心策划，带头捐资，将掘出的画像石就地建屋保护，并请翁方纲撰碑捶石，以纪此盛事。不仅如此，他还制订价格取费，以杜绝滥拓之风。

武氏祠画像石的重大发现，使汉画像石的著录和研究更为盛行。自此到20世纪初，金石学对汉画像石的著作，或著录内容，或摹画图像，或考榜题故事，或作题跋品评，数量不下百种。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毕沅、阮元的《山左金石志》，黄易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王昶的《金石萃编》，方朔的《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瞿中溶的《汉武梁祠画像考》，刘喜海的《金石苑》，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端方的《陶斋藏石记》，王懿荣的《汉石存目》等。另外，在一些地方志或金石条目中，也著录了当地发现或遗存的汉画像石。此时，对汉画像石的著录不仅在地域和数量上大为增多，而且对内容

的著录和研究也都加深了一步。如《山左金石志》中著录的汉画像石,仅山东所出就有150余石,包括今嘉祥、济宁、金乡、微山、曲阜、邹城(原邹县)、汶上、新泰、长清等地,而且对所有的画像内容都作了较详细的文字描述。瞿中溶的《汉武梁祠画像考》亦是对汉画像石内容进行考证研究的力作。

金石学之法有人概括为“大约不出于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录其文者,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记载者,有分类编纂者。或考其时代,或述其制度,或释其文字,或评其书迹,至为详备”。金石学对汉画像石的著录,不仅积累保存了许多汉画像石资料,而且对汉画像石的发现和研究有开创之功。但是,传统金石学对汉画像石的著录与研究是存在局限性的。一是著录的资料主要来自未经科学调查和发掘的零散画像石,有些甚至是依据收集来的拓片,而且不少旧拓本又擅意取舍,不取全貌;二是著录和研究内容多偏重于榜题文字,对大量无榜题的画像与花纹则不甚注意。此外,对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等问题的研究,也未能涉及。由于受到时代和方法的局限,金石学不可能对汉画像石作全面的考察。

2. 汉画像石研究逐步纳入考古学领域

20世纪初,随着近代考古学在我国的产生和确立,对汉画像石的发现与研究也开始走出金石学家的书斋,逐步迈入田野考古学的领域,而金石学的著录方法仍被沿用。

在20世纪初的20年间,法国的沙畹、色伽兰和日本的关野贞等,分别调查了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汉代石祠、石阙、崖墓及其画像,并运用照相、测量、绘图等近代考古方法进行了记录。日本大村西崖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则以照片方式著录了许多汉画像原石与拓片资料,并第一次将其纳入美术史的范畴予以介绍。1933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东滕州(原滕县)发掘了一座汉画像石墓(传称“曹王墓”)。这是第一次对汉画像石墓的正规发掘。在抗日战争时期,原中央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的一些学者,又对四川彭山、乐山及重庆等地的汉代崖墓及画像石棺、石阙做过一些调查、发掘。

三四十年代,各地又有新的零散汉画像石发现和著录。继董作宾在20年代(时为北京大学国学门的研究生)于其家乡南阳发现汉画像石后,其他学者接踵而至,相继有关百益的《南阳汉画像集》和孙文青的《南阳汉画像汇存》出版,刊载汉画像石拓本140余幅,使南阳地区的汉画像石首次为世人所知晓。在原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主持下,为该馆附设的金石保存所收集了山东滕州等地出土的许多汉画像石,并编著了《山东省立图书馆金石志初稿》。除著录本馆收藏的汉画像石外,还列举了山东乃至全国各地发现的汉画像石情况。1936年,又有容庚的《汉武梁祠画像录》问世,该书对武氏祠画像石专门作了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但其内容还是基本沿用金石学著作。40年代末,傅惜华收集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汉画像

石拓片千余幅,于50年代初出版了《汉代画像全集》初编、二编。虽其著录的都是山东汉画像石,而原先拟就的其他地区汉画像石的三编、四编未能再编辑出版,但也为汉画像石的资料积累做出了一定贡献。

从总的情况来看,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对汉画像石资料的积累,虽然还主要是通过调查进行的,考古发掘做得较少且零散,但已经开始了较科学的收集和著录。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突破以往对画像题材内容孤立的考证,而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考察。中国营造学社及国外学者对山东、河南、四川等石祠、石阙形制所做的调查注重对汉画像石所在建筑物形制和整体面貌的探讨。在这方面,美国的费慰梅于40年代初对武氏祠画像石的考察与利用画像石拓片所作的石祠复原图和有关问题的探讨,对认识这些零散汉画像石的相互关系与其本有的涵义,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意义。另外,随着对汉画像石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和有关资料的大量积累,此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题的研究文章。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原为金石学家所忽略的汉画像石雕刻技法与艺术风格也得到重视,关野贞、沙畹、费慰梅等外国学者对此都曾作过分析。20世纪30年代,滕固发表的《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文,把对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分析提到重要地位,并通过与希腊、罗马等石刻艺术的雕刻技法对比,把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分成“拟绘画的”和“拟浮雕的”两大类。这一见解,至今看来仍是遵循的基本分类。

3. 汉画像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汉画像石的发现和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显著成绩。1954年,对山东沂南北寨村大型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正式揭开了汉画像石墓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序幕。其首次发表的较系统、详实的发掘报告,推动了汉画像石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

根据各地发掘和出土汉画像石的情况,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山东、苏北地区,河南南阳地区,陕北绥德地区,四川成都及重庆等地,都相继发现了大批的汉画像石墓,从而为认识和划分汉画像石的主要分布区域进一步提供了实据。在以后的10年里,文物考古事业受到严重干扰,对汉画像石的发掘与研究工作的进展也做得较少。进入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汉画像石的发现与研究工作的进展有了更大的进展。除在上述各个地区都有大量新的发现外,在地域上又有扩展,如在与山东、苏北相邻的皖北、豫东地区,与河南南阳相邻的鄂北地区,与陕北相邻的晋西北地区等,都陆续进行了汉画像石墓的发掘工作。另外,浙江海宁,河南中部的新密(原密县)等地,也提供了重要的汉画像石墓资料。这使得我们对汉画像石的地域分布及其面貌有了新的更充分的认识。70年代末,在山东、苏北与河南南阳两个汉画像石分布的中心区域,相继发现

了属于西汉时期的早期画像石墓。如在鲁南、苏北地区发掘的一大批小型画像石椁墓,早的可到西汉武帝时期。在河南南阳地区的唐河石灰窑、湖阳镇和南阳赵寨等地,也都发现了属于西汉时期的画像石墓。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唐河新店始建于天凤五年(公元18年)的冯孺久墓。这座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改变了对上述地区汉画像石产生时间的传统看法,对汉画像石的产生时间和分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对汉画像石墓的发掘和出土实物日益增多,陆续出版了许多按地域编排的汉画像石图录,并在《中国美术全集》中选录了全国范围的汉画像石。这些图录除对画像石的图像进行著录并作文字说明外,大多又有对各地区汉画像石研究的概论文章,为汉画像石的研究和更广泛的利用提供了资料。由于汉画像石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其丰富的内容和诸多方面的价值日益显示出来,对汉画像石内容及其艺术形式的分析研究也广泛展开。除考古学和美术史的研究之外,又吸引了音乐、舞蹈、杂技、体育以及科学技术、宗教、民俗等诸多学科的参与。尤其在近十几年来,汉画像石研究逐渐出现了一个活跃兴盛的局面。

汉画像石考古研究,也由于其科学手段的加强和资料积累的日益丰富,水平不断提高,研究的范围与课题进一步扩展与深入。随着我国考古研究注重通过实物资料对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的探索,以及考古学文化的区域类型和分期断代课题研究的开展,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注意到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阶段性,即其区域类型和分期问题。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山东、江苏、河南等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这些地区汉画像石的分布状况、社会背景、雕刻技法、题材内容、地域特征及分期问题等进行了分析探讨。20世纪80年代初编写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曾以考古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初步将全国范围内的汉画像石进行分区,并作了汉画像石墓编年分期的探讨。而后,信立祥的《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一文,进一步打破行政的省区界限,对汉画像石的区域划分与分期断代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另外,在以往对汉画像石社会背景研究的基础上,对汉画像石产生背景及其艺术功能问题又有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在对地面石祠堂及其画像的研究和认识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80年代初,蒋英炬、吴文祺等通过实地的详细考察,最终解决了武氏祠的科学复原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武氏祠画像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使这批久负盛名的零散祠堂画像石成为完整的科学资料。此后不久,又在山东嘉祥宋山新出土的零散汉画像石中,发现并成功复原了现已不存在的另一种汉代墓地小石祠,并从这种小祠堂的特征上,认识到现存的许多画像石原本是这种已毁掉的小祠堂构件。从而,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对汉代墓地石祠堂的形制及其画像配置规律、内容特点等做出的进一步的论证。这使已经散乱的大量汉画像石,能够返其原有位置,重显本来面貌,更有利于汉

画像石研究的深入开展。

与此同时,国外与港台学者对汉画像石也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如日本长广敏雄的《汉代画像の研究》一书,对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等作了综合比较研究。书中还收录了德国学者道利斯·库劳瓦森关于分析武氏祠画像透视方法的论文。林巳奈夫对汉画像石中的车马出行制度、鬼神画像的涵义等题材内容的解释方面则颇为深刻。曾布川宽对汉画像石中的升仙图像亦进行了研究。土居淑子的《古代中国画像石》又作了较综合性的论述,并提出把汉画像石作为坟墓艺术并纳入世界坟墓艺术的视野来考察。在美国,巫鸿出版了《武梁祠——中国古代图像艺术的意识形态》一书,其极具新意的阐释,为汉画像石艺术史的研究开创了新的空间,在欧美艺术界曾产生较大影响。不过,他所推演的关于武梁祠画像是出自武梁本人的设计,以及祠堂后壁中央楼阁人物中的主人是汉朝皇帝等论点还值得商榷。台湾学者邢义田在其近年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关于汉画像石的研究或评述。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论从对题材内容的解释、雕刻技法的分析,还是从对重要散乱画像石建筑原貌的复原、区域划分与分期断代,以及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等方面,对汉画像石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成绩斐然。近年,信立祥又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文出版了《中国汉代画像石の研究》一书。这是一部较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汉画像石的专著,填补了我国汉画像石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第二节 南阳及其汉画像石

南阳地区位于河南省的西南部,地处汉水流域,东、北、西三面环山,是一个扇形盆地。这里河流纵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秦时在此设置南阳郡。西汉时,南阳郡因其所处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物产资源而成为农业和手工业极为发达的地区,南阳的冶铁业在汉代尤为著名,当时的冶铁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随着冶铁业的发展,铁制工具的质量不断提高、数量不断增多,为农业、手工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商业的繁荣,从而使南阳郡治宛城在西汉时就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五大商业都市之一,并享有“商遍天下”、“富冠海内”的美誉。正是南阳一带经济的日益富庶,才使其成为汉代大贵族依附和寄食的地方。西汉时就有不少王侯被封分在南阳,东汉王朝建立